

[工会研究]

工人文化宫职能变迁的历史逻辑^{*}

——以海口市工人文化宫为个案

冯 维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摘要】工人文化宫是职工文化生活发生的重要场域,作为国家推动工会群众文化事业发展的组织保障,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职能作用。从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个案来看,自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末,工人文化宫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项主要职能的实现程度、实现结构和实现方式上均发生了显著变化,其职能变迁大致经历了“政治”为主、平衡发展、萎缩停滞、全面复兴和围绕“文娱”五个时期。这一变迁过程显示,工人文化宫总是在国家意志和职工群众需求的合力中实现其职能,并受到组织环境和经济体制的决定性影响。这一发现呈现了工人文化宫在国家建设中发挥职能的实现机制,对在新时期推进工会群众文化事业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工人文化宫; 工会群众文化事业; 职能变迁

【中图分类号】D41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75(2020)05-0100-09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为了改善工人、职员的文化生活,借鉴苏联的成功经验与模式,全国掀起了建设工人文化宫^①的热潮。1950年至1954年间,全国工人俱乐部总数由789个增至12,376个,其中全市性的工人文化宫数量从16个增长至114个,这标志着工人文化宫登上了新中国的历史舞台。^[1]作为国家文化政策落实的组织保障和职工文娱活动发生的主要场域,工人文化宫见证了工会群众文化事业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变迁,也发挥了重要职能作用。梳理和分析这一职能的内涵及其演变,就成了学者理解新中国文化政策和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切入点。例如,刘宇以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为个案,考察了1950年至1966

年间文化宫组织的文艺活动,讨论了国家主导的“革命娱乐”与民间需要的“传统娱乐”间的张力;^[2]¹⁶⁶⁻¹⁶⁷胡霁荣则以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为个案,考察了“工人文艺”生产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阐释了国家文化政策的转型及动力;^[3]在郑州市工人文化宫(五一公园)个案中,邢国欣讨论了改革开放后工人阶级主体性的变化;^[4]王洪喆则阐释了工人文化宫在新中国建立的本土逻辑。^[5]已有研究基于相似的研究路径,即专注于揭示国家意志介入文艺作品和职工文化生活的机制和影响。这些研究的共同发现是,工人文化宫组织的文艺活动具有文化娱乐和政治宣教的两重性,工人文化宫不仅为文娱生活提供了公共空间,

*【收稿日期】2020-04-12

【作者简介】冯维(1989—),男,辽宁锦州人,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新中国社会史。

^① 本文所梳理的工人文化宫职能变迁的历史跨度大致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末,选择该时段一方面由于个案材料的时限是1952年至2009年,更为重要的是,21世纪以前工人文化宫职能实现的社会背景、重要事件和发展趋势都已凝固为历史,为总结其变迁逻辑提供了可能。而2006年以来工人文化宫在国家新的文化政策,即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获得了新的角色定位,这一变化的特征和意义还难以进行历史性总结,有待不断考察和研究。

也塑造了工人的阶级意识和文化表达，而职工群众在文化政策中的主体性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变化。

本研究对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个案进行了考察，尝试突破已有研究路径，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宏观层面理解工人文化宫的职能作用，梳理其变迁历程，总结其职能发挥的实现机制，进而对其变迁逻辑进行阐释。海口市工人文化宫成立于1952年，有近70年的发展历史，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都是当地职工群众文化生活发生的最重要场所。这里组织了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社会活动，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文娱生活的变迁和工会群众文化事业的兴衰。这一个案研究能够丰富工人文化宫研究的历史图景，为全面呈现工人文化宫职能、总结其变迁逻辑提供了可能。

一、工人文化宫职能变迁的历程

（一）“政治”为主（20世纪50年代初期）

1950年8月通过的《工会俱乐部（文化宫）组织条例》中规定，工人文化宫的工作内容是“进行政治宣传、生产鼓动，文化技术教育以及先进生产经验的交流，并组织工人、职员群众及其家属的业余文化休息与艺术活动”。^[6]这一规定表明，工会群众文化事业并不仅在工人文艺的层面展开，工人文化宫在国家建设和发展中也发挥了文化职能以外的经济和政治职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特殊背景下，工人文化宫的各项活动遵循“政治挂帅”原则，政治职能是其发挥的首要职能，主要表现为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

1952年下半年，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筹委会成立，在原有海口市工人俱乐部基础上，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筹建了自己的图书馆、运动场地和公共设施，还从北京购置了一部电影放映设备。借阅书籍、球类赛事、影片放映等文娱活动陆续开展起来。筹委会总干事转为文化宫主任，其下设置副主任和宣传、文体、行政场管等工作组。这就满足了全国总工会规定的工人文化宫开设的条件，即一定的活动场所、一定的组织形式和经常开展活动，海口市工人文化宫正式挂牌成立。工

人文化宫在全国的建立不仅反映了职工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更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新生政权性质的一种政治象征。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50年劳动节前期，由北京太庙改造的工人娱乐场所正式向群众开放，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了匾额——“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激动地评价这一事件：“说明我们工人阶级是真正的翻身了”。^[7]新生政权为工人文化宫的建立提供了政治前提，也对后者提出了政治要求。工人阶级作为国家领导阶级，意味着其阶级觉悟、凝聚力、文化水平和生产能力关系到政权的稳固和国家工业化的顺利推进。为了让工人群众形成这种先进性自觉，凝聚工人群众力量服务于国家建设，就必须通过宣传教育来提高职工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工人文化宫就成为这样一个阵地。为提高职工群众的政治水平，黑板报、文化宣传长廊、专题展览、广播等多种方式被用来宣传党的主张和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但这一时期，相比政治宣传，工人文化宫更为突出的政治职能表现形式是政治动员。

海口市工人文化宫成立之初，正值清除反革命分子的“镇压反革命”和针对资本主义“遗毒”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的尾声。为了使职工群众积极参与进来，文化宫内频繁地播报新闻，张贴宣传画，组织具有文艺才能的工人围绕运动主题自主创作，出版漫画刊物，举办展览，自编自演街头戏，通过多种文艺形式向职工群众宣传运动的斗争目标和重要意义。通过动员，职工群众普遍受到教育，并积极参与到政治运动中，向政府大量检举违法行为，其中检举违法资本家的“五毒”材料就达到3500件。类似的动员方法还运用在50年代初开展的土地改革、城市民主改革运动，以及1955年海口市开展的“肃清革命队伍内部的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中。^[8]³¹⁻³²在抗美援朝期间，海口市工人文化宫遵照党中央和工会指示，刊登了全国总工会发布的《关于号召全国工人阶级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言》，介绍了大量抗美援朝英雄事迹，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罪行，还特别举办了“反对美帝细菌战签名活动”，

广大职工纷纷签名,表达严正抗议。^{[8]30-31}显然,在巩固国家政权的背景下,工人文化宫为职工群众创造了诸多极具仪式感的集体行动的机会。在统一行动中,职工群众不仅仅作为被教育者接受国家“宣教”,^{[2]167-168}同时也是宣传载体的创作者和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作为创作者,在表达国家意志的过程中,职工群众提高了对自身阶级地位和先进性的认识;而作为运动的直接参与者,职工群众参与了国家政治建设,增强了阶级认同感和阶级团结。显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人文化宫的政治职能提高了工人群体的政治觉悟和凝聚力,有利于国家政权和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巩固。

(二) 平衡发展(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

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政权巩固工作基本完成,工人文化宫的政治动员也随之结束。国家建设的重心逐步转向生产生活方面,工人文化宫原本处于次要地位的经济和文化职能逐渐发挥并丰富起来,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职能平衡发展的局面。

在海口市工人文化宫成立初期,为了丰富工人文娱生活,文化宫组织了多次球类赛事和文艺活动,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以后,这类活动才逐渐丰富和活跃起来。因为在这一时期,工人文化宫配备普遍升级,并成为城市文娱生活的核心地带,其中的典型还得到了《人民日报》的报道。^[9]1958年,在海口市委支持下,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筹建新宫。新宫设有图书馆、电影院、剧场、球场、乒乓球室、工业陈列馆、宣传亭、绿化区等多个功能区,成为“当年海口市最新、最美的群众活动场所”。^{[8]48}新宫落成后,职工群众的文娱生活如火如荼地展开,职工及其家属们可以在这里进行体育锻炼,参加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象棋等体育比赛,欣赏美术和书法展览,观看电影和古装剧,编排现代剧,还能参加朗诵、乐器演奏、写作等各类业余文艺团体。^{[8]56-58}其中,电影放映最受群众欢迎。1957年,在设施简陋的情况下文化宫就放映电影280场,观众约16.5万人

次。1958年建成的瓦房电影院有600多个座位,日夜放映,经常座无虚席。^{[8]35,53}此外,海口市工人文化宫还组织了大量文艺培训和汇演,文艺培训项目涉及美术、戏曲、舞蹈、音乐等,接受培训的学员回到基层单位成为文艺骨干。文化宫还对各基层工会的职工文艺队进行指导,组织日常排练,参加文艺赛事和慰问演出。参加文艺赛事的职工并不仅限于有文艺特长者,如海口市工人文化宫1963年春举办的“大唱革命歌曲活动”,这项活动的主题从学习雷锋扩展为爱国主义和歌颂革命,活动形式包括歌咏晚会和歌唱比赛,参与范围包括每一个基层工会。近半数职工群众参与其中,很多基层单位全员参加,活动几乎影响到每一个职工家庭。^{[8]34-35, 55-56}慰问汇演则是联通“统一战线”的重要纽带。根据工会指示,文化宫文艺队要在周末和节假日深入市基层企业、部队和农村地区与基层群众联欢,促进阶级团结。^{[8]54-55}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组织慰问最远到达了隔海而望的西沙群岛,电影队在那里给当地职工放映电影,与当地职工结下了深厚友谊。^{[8]38-41}

经济职能在这一时期同样得到了很好的发挥。1955年4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了《关于加强工会俱乐部工作的指示》,强调工人文化宫工作要“面向基层,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10]而生产服务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技术教育,因为“在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不断地提高工人群众的科学技术水平,是发展工业生产、推进劳动竞赛、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重要条件”。^[11]为此,从1954年开始,海口市工人文化宫举办了数次先进生产成果和技术革新展览、开展生产技能竞赛、组织科学技术讲座,来推动生产机械自动化。例如,1954年4月,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创建“五一光荣门”先进生产成果事迹陈列室,宣传鞍钢技术等技术革新经验;1955年初开展了为期一周的“海口市技术革新展览”,观众达3万余人次;1960年文化宫又举办了“四化”(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展览,介绍了173项先进技术,参观人数达2万多人次,还有13个县的代表特地前来参观

学习。^{[8]33,59}此外，从1957年开始工人文化宫根据工会要求每月举办6场科学技术讲演。^[12]到60年代中期，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共举办了5次生产技能竞赛会，参赛者500多人次。文化宫还通过宣传焦裕禄、王进喜等全国劳动模范以及李秀春等本市劳动模范的光荣事迹，激发职工的敬业精神，通过主题活动配合“增产节约”生产运动，推动国家经济计划的落实。^{[8]59}

在政治职能方面，除了日常的政治宣传，这一时期文化宫还通过开展夜校学习和短期培训班来加强政治教育，讲授内容包括政治时事、国家大政方针、革命领袖事迹和党的理论思想等。例如，1961年举办了两次革命传统教育会；1963年开展了厂史、村史、剥削史的“三史”教育，举办了“社会主义教育展览”；1964年开设了毛主席著作学习辅导班等。^{[8]59-60}但在整体上，这一时期工人文化宫所发挥的政治职能并不处于首要位置。文化宫举办较多的是围绕促进经济生产和丰富文化生活为主题的活动，这些活动为每一个职工提供了参与文娱、提高文化素养的机会。同时工人文化宫积极配合生产鼓动工作以提高生产率，呈现出政治、经济、文化职能平衡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三）萎缩停滞（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初期）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文化宫的职能全面萎缩，甚至出现了工作停滞。1966年“文革”开始后，配合上级工会组织开展文艺批判就成为工人文化宫的一项主要工作。被批判的文艺作品曾一度在文化宫的舞台上演，博得职工群众的掌声，但“文革”中它们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包括《红叶题诗》《倒插金钗》等传统琼剧，《多瑙河之波》《柳堡的故事》等影片。同时，文化宫的图书馆也遭到了冲击和破坏，《家》《春》《秋》等名著被列为“禁书”。1962年文化宫举办的以“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为主题的文艺汇演，因其隆重盛大曾轰动一时，如今也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之一。^{[8]65}1967年初，海口市工会办公楼在红卫兵运动中被强占，工作人员散离，工会名存实亡。

按照规定，工人文化宫活动经费主要来自工会，组织机构和工作内容也由工会统一领导，^{[6]5-7}工会的瘫痪直接导致文化宫工作难以为继。在随后的“斗、批、改”运动中，革命委员会成为实际上的地方权力机关，文艺等各方面工作均卷入了这场运动。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时期海口市工人文化宫从主任到一般干部都在“五七”干校劳动、学习和接受审查。这就导致工人文化宫在“权”“财”“人”三方面陷入资源匮乏境地，不得不停止一切活动，无法发挥原有职能。1969年起隶属海口文化战线革命委员会的社会文化工作站负责领导工人文化宫工作，但受制于经费和人员短缺，文化宫的活动极为有限。^{[8]70-73}可以说，受工会组织瘫痪的直接影响，这一时期工人文化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职能全面萎缩，工作几经停滞，其作为引领工会群众文化事业建设的角色已经丧失。

（四）全面复兴（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工会工作的恢复，工人文化宫的活动也重新开展起来，并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大发展，重新成为职工群众文化生活的中心，回归为“工人的学校与乐园”。^[13]1973年中央要求各级党委抓好工会工作，同年6月海口市召开了第七届工会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新的工会领导机构，文化宫重归工会管理。工会随即充实了文化宫干部队伍，增加了经费补贴，工作逐步恢复。在政治职能工作方面，文化宫恢复举办报告会、辅导讲座宣传中央精神；建立建宫以来最长的宣传栏，由基层工会负责轮流展示学习心得和批判文章；举办阶级教育展览，内容包括革命领袖有关论述、阶级斗争事迹、海口今昔对比和争取更大胜利四个部分，被市委称为“长期阶级教育阵地”。^{[8]74-77}在经济职能工作方面，文化宫继续宣传来自本市基层企业的劳动先进人物，宣传推广新科学技术。文化职能工作上恢复了部分体育赛事和文艺培训，编排巡演了舞蹈等文艺节目。^{[8]81-84}

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各方面工作虽然得到了

恢复,但达到此前兴盛的水平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作为“工人的学校”,1982年夏,海口市工人文化宫恢复了废止6年的工人理论组,通过宣讲和培训的方式将中央精神和国家政策传达到基层。^{[8]103}此外,时事宣传长廊、政治学习班、辅导讲座以及主题展览在这一时期也得到恢复,文化宫还开展了通过“讲故事”进行国策宣传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新工作形式。故事讲解员编写了《虎门销烟》《甲午战争》《秋瑾》《南昌起义》等近代史故事,还编写了故事《并非是一家一户的事情》配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向职工群众宣传“晚婚晚育”“只生一个好”等观念。^{[8]104,111}为了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初期科技革新重新受到中央重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各地工会和工人文化宫积极响应。海口市工人文化宫举办展览、组织讲座、出版专刊,开办了喷漆喷焊等多种技术培训班。1982年7月,“文革”后的第一期文艺骨干学习班在文化宫内开课,设有舞蹈、声乐、器乐、书法等学习项目。^{[8]96,105}

而作为“工人的乐园”,工人文化宫在80年代初期恢复并丰富了文化职能工作,有些地方还增加了基建投入,建设了新的活动场所和设施,给职工群众带来了更好的休闲体验和文娱享受。^{①[14-16]}在海口市工人文化宫,乒乓球、篮球、象棋等各类体育活动重新活跃,传统古装剧等文艺节目重回舞台,长期停止的交谊舞会得到恢复,书法社团、集邮协会等文娱团体也重新组织起来。文化宫还定期举办相亲茶话会、节日游园会、灯谜会、读书会等活动。1981年夏,新建的工人影剧院竣工开业,这里汇集了来自上海、成都等全国各地的歌舞剧团,舞台上演着歌唱、朗诵、曲艺、戏剧、相声、小品、杂技等各类文艺节目。相比“文革”时期单调的样板戏,这一时期的文娱演出内容丰富、主题多样,满足了职工群众压抑已久的文娱需求。随着文化职能工作的恢复与发展,海口市工人文化宫恢复了往日的人气。据统计,1982年到文化宫的职工群众达到280多万人次,

平均每天约8000人次。^{[8]107-112}

(五)围绕“文娱”(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

伴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的深入,作为事业单位的工人文化宫也经历了企业化改革。在“自负盈亏”的情况下,为了生存和创收,工人文化宫的设施建设和活动设置围绕“文娱”展开,市场逐渐成为其职能实现的主要驱动力,文化职能发展的同时经济和政治职能逐渐式微。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全国的工人文化宫普遍开始制度改革,其职能定位也在改革浪潮中悄然变迁。

1983年,海口市总工会拨付给文化宫的经费开始减少,到1985年不但没有拨付,更要求年终有所结余。^{[8]122}为了增加收入、提高效益,海口市工人文化宫进行了三方面改革。一是通过管理权下放、精简机构来提高管理效率,二是通过改变聘任、绩效考核和工作分配的办法来提高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三是在业务中开展有偿的经营性活动。最后一项改革彻底改变了文化宫的资源投入结构,职能发挥围绕“文娱”展开的特征愈加明显。一方面,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开办了有偿培训,除已有的歌唱跳舞等文艺培训,还新办了桥牌、交谊舞、气功、会计、调酒师、电脑、酒店经营管理、食品雕刻工艺、证券知识、建筑施工预算等有偿培训班,还有针对少年儿童的暑期补习和英语培训。^{[8]149,179}很多工人文化宫在80年代中期后都出现了类似现象。^[17]这些新的培训服务不仅反映了改革时期职工群众逐渐多元的文娱选择,也是对不断涌现的新生行业职业人才需求的一种回应。

另一方面,工人文化宫还逐渐开发了自营、合营和外租等形式的营利项目,包括招待所、小卖部、健身房、自营卡拉OK、茶厅等,其中游艺园和电影院成为创收主力,吸纳了文化宫内大部分财力、人力。以电影放映为例,文化宫先后建立了三个影剧院。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在90年代投资近百万元改善投影、音响、空调、座位等设备设施,同时设置小厅和雅座来满足高消费人群

① 这一时期《人民日报》刊载了多篇报道展现职工群众在工人文化宫丰富的文娱生活。

的观影需求，整个90年代电影放映都是文化宫收入的最重要来源。^{[8]170-175}此外，文化宫场地外租给市场个体经营音响店、健身房、电子游乐厅和摄影服务社，不仅丰富了文娱服务项目，而且通过收取租金和物业管理费增加了收入。^{[8]144,154}海口市工人文化宫还积极与企业合作，联合开展活动，如与海口纺织印染厂举办“印染杯”歌咏大奖赛，与海口罐头厂等企业举办“金秋舞会”等。联办方式减轻了文化宫自身负担。^{[8]155}在整个90年代，工人文化宫涉足经济服务领域并使其成为改制创收的一个普遍途径，有些地方工人文化宫甚至被称为“企业家的新知己”。^[18]

1997年全国总工会下发的《全国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县以上工人文化宫俱乐部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工人文化宫主要职能是，“为广大基层单位和职工及其家属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教育、休息等服务，努力满足广大职工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也面向社会，为公众服务”。^[19]这标志着工人文化宫在建宫之初确立的政治和经济职能已经退化，文化职能成为主导，并由市场力量驱动，直接面向消费者的日常文娱需求，工人文化宫的职能定位彻底发生了转型。但是，工人文化宫在世纪之交普遍面临着生存难题，“时代在前进，曾经的弄潮儿，也可能成为今天的落寂者。”^[20]作为省级经济特区，海南省第三产业发展迅速，90年代后期海口市各类高档影厅、舞厅、游乐场所层出不穷。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已经不再是具有优势的文化服务供给者，文化宫收支从1997年开始就处于勉强维持收支平衡或亏损的状况。2001年，曾是创收大户的游艺园因设备陈旧、收入下降，停止经营。^{[8]168}同时海口市出现的多个影剧院在运营上与工人文化宫相比，更好地遵循了市场逻辑，从而吸引了大量观影人群，导致工人文化宫的电影放映收入在2002年后显著下滑。^{[8]311}如何增强市场竞争力，在工会群众文化事业中找到自己新的职能定位，是工人文化宫在新世纪面临的新挑战。

二、工人文化宫职能的实现机制与变迁逻辑

从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个案来看，自20世纪

50年代初期到20世纪末，工人文化宫的职能发挥在实现程度、实现结构和实现方式上均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职能发挥实现程度上，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经历了两次高峰和一次低谷，两次高峰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在高峰期工人文化宫的工作种类多、职能涉及层面广。一次低谷是指1970年前后的“文革”时期，这一时期工人文化宫的职能全面萎缩，甚至陷入工作停滞。在职能发挥实现结构上，最初工人文化宫被赋予了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职能，但三者的权重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50年代初期政治职能占据主要位置，随后政治、经济、文化职能平衡发展。在经历了短暂萎缩后，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化职能逐渐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进入90年代政治和经济职能式微，直至丧失，工人文化宫的职能定位彻底发生转变。在职能发挥实现方式上，改革开放前后呈现明显不同，改革开放前在具体工作中表现为融合交叉的特征，即一项工作常常要发挥政治、经济和文化三重职能。但在改革开放后，职能发挥在具体工作中分离，呈现出文娱生产和文化传播独立发展特征。

工人文化宫职能发挥具有怎样的实现机制，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它的职能变迁呢？从理论层面出发，如果将工人文化宫的职能工作看作是一种公共文化消费品，那么需求方是职工群众，供给方是国家，工人文化宫总是在职工群众的文化需求与国家发展工会群众文化事业的意志和策略的合力中发挥其职能。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个案中体现了这一动力机制，但国家意志和职工群众需求的内涵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影响力也在发生变化。在内涵方面，国家推动工会群众文化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意志是贯穿始终的，但在不同历史背景下，文化工作的具体策略、内容和方式有所不同。比如，在革命时期的城市工人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主要利用文化教育和文娱活动来传播革命思想；在巩固国家政权和计划经济建设时期，工人文化宫的工作强调在各项活动中要“渗透集体主义意识、共产主义精神的教育，

批评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和恶习”；^[21]改革开放后，国家则强调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同样，职工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也会伴随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而发生变化。比如在建国初期，保障基本的文娱生活、参与体现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文化活动是职工群众的需要，而改革开放后这种文化需求愈加多元化，消费能力和审美取向也发生了分层。进一步，变化中的国家意志和职工群众需求如何发挥影响力呢？从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个案来看，这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工人文化宫所处的组织环境，特别是它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二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经济因素，集中体现在国家经济体制上。

具体来说，在工人文化宫的组织环境和权力结构定位方面，工人文化宫由工会领导，后者决定了其组织结构和人事任命，在计划经济时期工人文化宫的活动经费也主要来自工会拨款。^{[6]7}国家发展工会群众文化事业的规划和具体工作通过科层式的组织序列传达和落实，即“党中央——全国总工会——地方总工会——地方与基层各级工人文化宫（俱乐部）”。总工会颁布了《工会俱乐部（文化宫）组织条例》《工会俱乐部（文化宫）管理委员会工作条例》等条例来指导和约束工人文化宫的组织行为，对电影放映、图书馆建设等具体工作也有明文规定，同时具有审查讲演、报告、文艺节目等具体活动内容的权力。这一套制度安排是工人文化宫发挥职能的基础。1970年前后，受工会系统瘫痪的影响，工人文化宫停止了工作，也丧失了职能。正是依托于工会，在工人文化宫职能发挥的高峰时期，国家意志和国家资源能够顺利渗透和投入到具体工作中去，包括文娱设施的建设和改善，通过基层工会建立文艺团体，举办文艺汇演，与科学技术普及委员会等事业机构合作发挥职能，成为联系工农兵的统一战线纽带，等等。因此，工人文化宫的职能实现首先受到组织环境的影响，在计划经济时期这一点尤其明显，相比职工需求，这一时期国家意志或者说供给方对工人文化宫的职能发挥影响更为显著。

但在更深层次上，工人文化宫的职能发挥受到生产方式和经济体制的决定性影响。工人文化宫所依附的工会系统在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上具有科层式和集中式特征，这正是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体现。后者直接决定了工会的结构规模和组织逻辑，也为工人文化宫与职工群众发生紧密联系提供了可能。在海口市工人文化宫个案中，1953年海口市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个体手工业者成为“工人”，原本在初级集体化阶段成立的手工业社员文化宫随即并入了市工人文化宫，^{[8]49-52}这说明工人文化宫的影响范围受到经济基础的根本影响。如果职工群众不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组织起来，那么工人文化宫职能发挥的成本将大幅提高，影响力也将大打折扣。

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伴随着国家发展工会群众文化事业意志和职工群众文化需求的改变。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围绕经济建设展开，在政治方面“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22]在生产鼓动方面，市场成长也催生和培育了新的劳动力技能需求和职业培训机构，政府无意、工人文化宫也无力承担工业生产和第三产业中科学技术传播与技能培训的任务。政治和经济职能的退化使得文艺工作逐渐回到了文化本身的发生逻辑。与此同时，如前文所述，经济体制转型也促成了职工群众文化需求的变化。在大量海外文化思想和文娱消费品传入的背景下，职工群众的文化需求呈现出显著的多元化和娱乐化倾向，而职工群众的内部分层也导致了不同层次、不同消费水平的文化需求。最后，经济体制转型导致了工人文化宫职能实现的动力从供给侧滑向需求侧。在计划经济时期，工人文化宫在文化消费品供给上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而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这种近乎垄断的地位逐渐丧失。在生

存和“创收”压力下，在职工群众从一个整体“阶级”变为分散的个性化消费者的趋势中，满足多元化的文化需求就成为工人文化宫职能发挥过程中的最重要考量，“文娱”成为工人文化宫职能工作的中心。

三、结语

党领导的工会群众文化事业在工运史上和国家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全面梳理工人文化宫职能变迁的历程，揭示其实现机制和变迁逻辑，既是对历史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未来工作的启示。正如本研究个案中所展现的，工人文化宫的职能发挥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变革不断作出策略调整，二是保持通畅有力的组织支持。这样才能将国家意志和职工需求紧密结合，形成合力，推动工会群众文化事业的持续发展。无论在计划经济体制，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精神文明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追求的发展目标。21世纪以来，工人文化宫的普遍衰落已经成为事实。但在更长远的历史视野下考察，工人文化宫的转型和发展仍具乐观前景，国家领导和发展工会群众文化事业的意志并未松动，且具备坚实的组织支持和随社会经济变革进行工作调整的能力和制度基础。^{①[23]}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工人文化宫有机会重归职工群众文化生活的中心舞台。

[参考文献]

- [1]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在全国第二次工会俱乐部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M]// 全国总工会宣教部. 工会群众文化工作文件资料选编 (1950—1987). 北京: 地震出版社, 1988: 371.
- [2] 刘宇. 娱乐与革命——1950—1966 年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J]. 江苏社会科学, 2013(5).
- [3] 胡霁荣. 社会主义中国文化政策的转型——上海工人文化宫与当代中国文化政治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 [4] XING G X. Urban workers' leisure culture and the "Public Sphere": A stud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er' Culture Palace in the Reform-Era China [J]. Critical Sociology, 2011, 37(6): 817-835.
- [5] 王洪喆. 工人文化宫、中国东北与 20 世纪的文化政治 [N].

中华读书报, 2015-12-09(13).

- [6] 工会俱乐部(文化宫)组织条例 [M]// 全国总工会宣教部. 工会群众文化工作文件资料选编 (1950—1987). 北京: 地震出版社, 1988.
- [7] 劳动人民文化宫揭幕 李立三及捷大使等均往致贺 [N]. 人民日报, 1950-05-01(03).
- [8] 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志编辑委员会. 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志 (1951. 10 ~ 2009. 12) [M]. 海口: 南方出版社, 2010.
- [9] 新华社. 活跃的太原工人文化宫 [N]. 人民日报, 1955-05-12(02).
- [10] 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工会俱乐部工作的指示 [M]// 全国总工会宣教部. 工会群众文化工作文件资料选编 (1950—1987). 北京: 地震出版社, 1988: 55.
- [11] 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关于加强科学技术宣传工作的联合指示 [M]// 全国总工会宣教部. 工会群众文化工作文件资料选编 (1950—1987). 北京: 地震出版社, 1988: 28.
- [12] 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关于 1956 年对职工进行科学技术宣传工作的协作计划纲要的联合通知 [M]// 全国总工会宣教部. 工会群众文化工作文件资料选编 (1950—1987). 北京: 地震出版社, 1988: 104.
- [13] 刘树发. 陈毅年谱: 上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610.
- [14] 卢滢. 工人的文化摇篮——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巡礼 [N]. 人民日报, 1983-05-01(04).
- [15] 刘见, 杜中兴. 海河新厦——记天津市第一工人文化宫 [N]. 人民日报, 1983-05-01(04).
- [16] 徐英烈. 宁园沧桑——记天津市铁路工人文化宫 [N]. 人民日报, 1983-05-08(07).
- [17] 贾东. 太原市利用工人文化宫举办培训班 [N]. 人民日报, 1984-11-24(04).
- [18] 刘茜. 企业家的新知己——贵阳市工人文化宫为经济服务纪实 [N]. 人民日报, 1989-01-12(03).
- [19] 全国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县以上工人文化宫俱乐部建设的若干意见 [M]// 肖振邦. 中国工会年鉴.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8: 437.
- [20] 胡洪江, 杨彦, 王伟健, 等. 普遍缺人缺钱缺文化, 生存日益艰难 工人文化宫很纠结 [N]. 人民日报, 2011-04-28(12).
- [21] 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全国第二次工会俱乐部工作会议的报告 [M]// 全国总工会宣教部. 工会群众文化工作文件资料选编 (1950—1987). 北京: 地震出版社, 1988: 62.
- [22] 邓小平.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贺词 [M]//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213.
- [23]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M]//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558-583.

^① 2011 年 10 月,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 工人文化宫被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并提出要“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这是国家意志在适应市场经济和坚持文化建设“人民性”和社会主义属性的又一次策略调整。

A Study into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Function Changes of Workers' Cultural Palace

—— Taking Haikou Workers' Cultural Palace for Example

FENG Wei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Abstract: The Workers' Cultural Palace, as an important place of cultural life of employees and an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 for our countr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ass cultural undertaking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our national construction. Take the Workers' Cultural Palace in Haikou City for instance, it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roles, structure and ways of realizing the three main functions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 to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Its changes of functions can be roughly boiled down to the five periods of "politics" as the mainstay, balanced development, shrinking and stagnation, full recovery, and the "revival" of entertainment. This process of changes, hence, shows that it always fulfills its functions in the joint force of the will of our country and the needs of workers, which has been seriously affected by the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system. The facts above present the 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the Workers' Cultural Palace in our 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have important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new development of workers' cultural undertaking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Workers' Cultural Palace; mass cultural undertakings of trade unions; changes in functions

[责任编辑: 徐文粉]

(上接第86页)

Reflections on the Rule of Risk Burden of Wage Payment when Payment for Labor Fails

——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ormalization of COVID-19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ING Wanjing

(*School of Law, China University of Labor Relations, Beijing 100048*)

Abstract: Under the current background of normalization of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mpanies may face suspension of production due to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at any time. This kind of labor contract performance is neither attributable to the worker nor to the company's inability to pay for labor, which constitutes the inability to perform the labor contract.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ed enterprises have stronger risk-bearing ability than workers and should bear the risk of continuing to pay wages according to the rules and concepts of traditional private law and labor law.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croeconomic development, continuous payment of wages is undoubtedly worse for companies that suspend the work and prod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ost countries share the risks of enterprises through the function of social insurance systems, and supplement the material needs of workers through social insurance to achieve the ultimate goal of ensuring employment. The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indicate that first, our country should reflect on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labor law in response to the pandemic. Second, under the current background of normalization of COVID-19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e should deal with the ongoing crisis brought about by the pandemic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of labor consultation, labor relations, and stable employment.

Key words: COVID-19 pandemic situation; labor contract; wage payment; risk; social law

[责任编辑: 孙蕊]